



【对话】

东京奥运会特刊

TOKYO 2020

东京奥运会特刊

2021年8月2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李小晨

A7



专访东京奥运国际箭联技术代表郭蓓

先河后海齐头进 玄圃积玉润无声



中国要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这条发展之路上既有“更快、更高、更强”,也有通衢广陌后更缤纷的玄圃积玉。这回,记者就跟“单项赛场上她最大”的东京奥运会、东京残奥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郭蓓女士聊了聊,请她来与大家分享一些幕后故事。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777,这是此番赴日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不过,一旦到了赛场你就会发现,来到这项奥林匹克盛会上共襄盛举的中国面孔,其实还有更多。

技术代表和裁判员,他们是让一届奥运会得以顺利举行的幕后功臣。“东京奥运会的技术代表和裁判员里,包括我在内有6个人来自上海,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历届奥运会上人数最多的一次了。”从1992年巴塞罗那就开始担任奥运会裁判的郭蓓,此番她有了新的身份——东京奥运会、东京残奥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

若没有技术代表的签字认可,一场比赛甚至都没法开始。所以通俗一点来讲,在射箭赛场上,郭蓓就是责任最重的那两人之一(该项目设两位技术代表)。她此次的主要责任是要确保奥运会比赛中技术方面规划和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有关比赛场地内(FOP)的技术事宜上,可以说她代表了国际箭联的最高权威。

本届奥运会的射箭赛场设在东京的梦之岛公园内,而举办于2019年的奥运测试赛,就是对这片场地的一次关键“调试”。赛场附近某栋建筑的玻璃有反光,会对选手造成影响,需要协调;场地内容易积水,遇到下雨天会成问题;场地内还存在地面不平整的情

况,需要改进;运动员的检录室大小,得酌情加大;洗手间设置的数量不够且位置太远……这些都是在测试赛中由运动队或工作人员反馈的问题,也是郭蓓作为技术代表需要去推动处理的工作。

自1987年起,郭蓓便以国际裁判的身份出现在赛场上,之后执裁过四届奥运会。与以往当裁判时相比,她觉得这回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以往的专注于一事,过渡到了更丰富、更细节的体验中。

“小到一张靶纸、一份班车时刻表,大到在技术层面对整个场馆布置的认可,对赛程的安排和调整,全都是技术代表要负责的事。虽然在有些事情上我也经历了从头开始学习的过程,但能在奥运会上获得认可还是很荣幸。”

郭蓓觉得,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她所熟悉或听闻到的在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与其他国际体育机构中担任工作的中国体育人明显多了。“很高兴看到参与进来的体育人越来越多,也很高兴看到国家在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上越来越重视。”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曾对世界体育领域的话语权有过如下阐述:“我认为话语权一定要争取,真正掌握话语权,必须进入国际体育组织的执委会层次,才能谈得上话语权,比如对修改章程、对制定规则、对享受资源、对举办城市的决定等。但不是说我们有了话语权,就可以要金牌,或者通过我们话语权,能够把金牌拿走。金牌要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培养运动员去获得金牌。”

中国体育的发展,有赖于更全面“地基”的支持。当更多的幕后英雄登上大赛舞台,中国体育也就迎来了更蓬勃向阳的明天。



郭蓓(右)

放不下的奥运梦 勇尝鲜的探路者

中国第一位国际射箭裁判、亚洲第一位奥运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教育学博士、原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原国家射箭队运动员、原上海射箭队教练……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元的岗位经历,让郭蓓对奥运会有了更丰沛的情感。

在由一名运动员到成为东京奥运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的漫漫之路上,一开始,郭蓓心里的想法就是七个字——“我想参加奥运会”。

由于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原因,运动员时期的郭蓓虽然成绩优秀,却与奥运会无缘。就算不能以运

动员身份参加奥运会,我也不想放弃。”1984年,机会来到了她的身边,在彼时国家体委的支持下,先是赴香港参加培训班,之后又参加了国际箭联在广州开设的国际裁判专项培训。在经过一路摸索后,1987年,郭蓓成为了我国第一位国际射箭裁判。

1992年巴塞罗那,郭蓓终于实现心愿,以裁判员身份参加了奥运会。一路坚持到今天,这已经是她的第五届奥运会。因热爱而坚持,因坚持而融入,这是郭蓓的奥运故事,也是更多幕后英雄共同的特质。在此,请为他们也送上掌声。

五年筹备期,全能大当家

从在2016年时就确定将担任东京奥运会、东京残奥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到此番真正履职,受新冠疫情影响,郭蓓经历了较寻常模式更久的五年准备。若问“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那她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围绕防疫而展开的一系列准备工作,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除非选手已经站到起射线上引箭待发,不然,无论是在训练时、赛前热身时、靶前拔箭时还是计时时,运动员都应当佩戴口罩。原本在排名赛阶段,是两名选手打一个靶,后来为了安全防疫,变成一名运动员对应一个靶,于是赛场的靶位数就从32个增加到了64个。由相对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入境日本的队伍,他们在观察期内虽可进

入场地练习,但会被请入一块相对独立的靶位区,且如安放靶纸等常规环节需由他们自己去完成。

诸如此类在疫情前从没出现过的“附加题”,这回却在技术代表的工作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重。

“曾经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在对接东京奥运会的工作上,精力几乎全都扑在了防疫方面。真正射箭比赛中的技术问题,都有一定先例可循,但在加入防疫的新情况后,就会变成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再遇到问题、再去解决这样一种反复的状态。”幸好,如今东京奥运会的射箭赛程已全部结束,在送别各支参赛队后,郭蓓由衷觉得,平安又顺利地完赛就是对她本次技术代表工作的最大肯定。

◆东京日记

即将获得“地铁自由”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当你们看到这篇日记时,我应该已经迫不及待地奔赴主新闻中心,去领取奥运TP卡了。今天是我入境日本后的第15天,在满足“14天观察期”的条件后,东京的公共交通系统正在向我招手,而奥运TP卡将就是我的免费乘车证。

不过,问题来了。近两天,东京的日增新冠肺炎阳性确诊数已在4000例上下浮动,如此情况下,我还敢利用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来

完成工作出行吗?答案挺简单的,敢,肯定敢!

其实,无论是媒体们入住的奥运官方酒店,还是我们常会用到的奥运专属出租车,它们每天都处于既接待奥运相关人士,又向日本民众提供服务的状态(所有人都能在路边扬招空车状态下的奥运出租车)。这种“防疫泡泡”真的很自由任性。在如此情况下,过于讲究真的形同“自虐”。

东京奥运会已经进度过半,但据称一直在改进中的班车系统仍旧

保持着时好时坏的状态。不准点、路线绕以及班车与班车间可能存在的较长间隔,这些都是让记者们对它爱不起来的原因。

以从我所住的酒店去到举办闭幕式及田径比赛的新国立竞技场为例,搭乘班车需绕路转车一次,即便在前后班车可顺利衔接的情况下,最短耗时也需90分钟(碰到点情况就不好说了)。而如果是搭地铁出行,20分钟足矣。

在搭班车费时又累心、频繁使用出租车又让人深感高攀不起(关于东京出租车收费标准之贵,我就不赘述了)的情况下,根据防疫规定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我,大概真的难以抵挡住来自东京地铁的诱惑。